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智库丛书

第二辑

刘捷◎主编

# 制度选择与 钟摆式发展

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

姜涵◎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拉丁美

第一輯

ILAC-SNUST  
西南師範大學拉美研究中心

刘捷◎主编

# 制度选择与 钟摆式发展

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选择与钟摆式发展：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  
悖论 / 姜涵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 - 7 - 5203 - 2202 - 7

I. ①制… II. ①姜…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阿根廷  
IV. ①F17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3022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闫纪林铨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得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出版资助

# 目 录

|                        |     |
|------------------------|-----|
| 导言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的独特历程 ..... | (1) |
|------------------------|-----|

|                        |      |
|------------------------|------|
| 第一章 阿根廷发展进程的历史回顾 ..... | (21) |
|------------------------|------|

|                      |      |
|----------------------|------|
| 第一节 阿根廷发展进程的断裂 ..... | (21) |
|----------------------|------|

|                               |      |
|-------------------------------|------|
| 第二节 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局限性 ..... | (25) |
|-------------------------------|------|

|                                |      |
|--------------------------------|------|
| 第三节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局限性 ..... | (33) |
|--------------------------------|------|

|                              |      |
|------------------------------|------|
| 第四节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局限性 ..... | (42) |
|------------------------------|------|

|                           |      |
|---------------------------|------|
| 第五节 基什内尔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局限 ..... | (50) |
|---------------------------|------|

|                          |      |
|--------------------------|------|
| 第二章 阿根廷制度变迁的初始制度禀赋 ..... | (56) |
|--------------------------|------|

|                        |      |
|------------------------|------|
| 第一节 阿根廷的初始经济制度禀赋 ..... | (56) |
|------------------------|------|

|                        |      |
|------------------------|------|
| 第二节 阿根廷的初始政治制度禀赋 ..... | (62) |
|------------------------|------|

|                        |      |
|------------------------|------|
| 第三节 阿根廷的初始意识形态禀赋 ..... | (66) |
|------------------------|------|

|                              |      |
|------------------------------|------|
| 第四节 基本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匹配性和独立性 ..... | (71) |
|------------------------------|------|

|                    |  |
|--------------------|--|
| 第三章 阿根廷社会阶层结构的演进及其 |  |
|--------------------|--|

|                |      |
|----------------|------|
| 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 (77) |
|----------------|------|

|                          |      |
|--------------------------|------|
| 第一节 断裂状社会的形成及其阶层结构 ..... | (77) |
|--------------------------|------|

|                          |      |
|--------------------------|------|
| 第二节 断裂状社会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92) |
|--------------------------|------|

|                               |       |
|-------------------------------|-------|
| <b>第四章 阿根廷发展进程中国家制度和行为的演变</b> | (118) |
| 第一节 职团主义与“勾结型国家”的产生           | (118) |
| 第二节 制度性缺陷与易被集团“俘获”的国家         | (125) |
| 第三节 国家衰弱在阿根廷发展进程中的表现          | (136) |
| <b>第五章 阿根廷断裂状社会的治理策略</b>      |       |
| ——庇隆主义                        | (150) |
| 第一节 庇隆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          | (151) |
| 第二节 庇隆主义的发展与演变                | (158) |
| 第三节 庇隆主义的政治策略                 | (182) |
| <b>第六章 结论:对阿根廷国家衰落的反思与启示</b>  | (201) |
| 第一节 对阿根廷钟摆式发展的反思              | (201)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209) |
| <b>参考文献</b>                   | (216) |
| <b>后记</b>                     | (236) |

#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的独特历程

###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根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和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通过发挥农牧业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崛起，一度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龙头。1945 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分别是巴西和墨西哥的 3 倍和 2 倍，直到“二战”结束后的 1950 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大致相当<sup>①</sup>。但好景不长，当德、法等国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并重回世界强国之列的时候，阿根廷的发展却陷入“过山车”式的恶性循环，其经济在“危机——改革——危机”的钟摆中踟蹰前行，从一个盛极一时的富裕国家逐渐沦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衰落国家。到 2000 年年底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时，其人均 GDP 只有澳大利亚的不到 1/3。<sup>②</sup> 如图 1 所示，阿根廷人均 GDP 在所统计的世界近百个经济体中，排名已从 20 世纪初的第 13 名逐步滑落到近年来的 35 至 40 名之间。阿根廷由盛转衰，特别是其“从危机到危机”的大起大落式发展进程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

<sup>①</sup> José María Fanelli, *La Argentina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el Siglo XXI*, Editores Siglo Veintiuno, Buenos Aires, 2012, pp. 131 - 133.

<sup>②</sup> Ibid., p. 133.



图导—1 阿根廷人均 GDP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变化

数据来源：Pablo E. Guido, “Los dos siglos de Argentina en clave institucional”, *Documentos* No. 120 de CADAL de Argentina, 5 de April de 2011. p. 2.

20 世纪阿根廷由盛转衰、危机不断地发展历程被许多人称为“阿根廷之谜<sup>①</sup>”。学界对“阿根廷之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其解答大致上可以分为历史文化决定论、发展政策失误论、外部环境制约论（依附论）、政治危机论等几种。其中文化论主要宣扬民族精神和集体性格对长期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阿根廷继承的西班牙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美国所信奉的新教文化是决定两国发展路径和绩效差异的主要根源。依附论主张结构性经济关系特别是畸形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阿根廷的权利分配和政治发展，认为影响一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政治危机论认为，阿根廷的落后不是单纯的经济结构和政策问题，而是政治动荡引起的，特别是“二战”后阿根廷频繁爆发军事政变，每次政变都带来了政治倾向

<sup>①</sup> 董国辉：《学术史视野中的“阿根廷之谜”》，《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1 页。

的转变和经济政策的摇摆，政局动荡还使民众丧失了稳定的预期，造成经济行为短期化和营商投资环境不断恶化，最终降低了经济效率。

通过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每个观点和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阿根廷独特的发展进程，但它们的解释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有交叉包容之处，部分观点甚至可以相互补充。不过，这些观点忽视了近代以来阿根廷发展路径的历史特点和基本制度结构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很难系统地解释阿根廷发展的前后有别以及钟摆式发展的特点，而政治危机论是制度危机的表象而非原因。

有鉴于此，本书将透过“钟摆现象”这一阿根廷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路径特征，从阿根廷在民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策选择中剧烈摇摆，揭示出初始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形成了阿根廷特殊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结构制约了阿根廷的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特别是当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农牧业寡头（后期转型为横跨农牧业、服务业和工业的“多种经营”寡头）和具有选票优势的劳工集团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西班牙殖民经历遗留下来的考迪罗主义及其庇护——依附关系架构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和分配冲突。特别是“开明”的寡头集团推行代议制民主却又通过舞弊和暗箱操作垄断政权，造成了各阶层对基本制度缺乏共识和尊重，而以南欧移民为主的劳工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使这一集团高度自治但政治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阿根廷最终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彼此敌视的“断裂状”社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底层民众从农村涌入城市，但城市市民社会发育滞后、民间组织匮乏、传统政党不愿代表这一新兴阶层利益等现实情况，使得大量摆脱了农村庇护关系网络的人群处于原子化和政治动员性较强的状态，这为民众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随着庇隆上台执政和庇隆主义的确立，民众主义正式登上了阿

根廷的历史舞台。在“断裂状”社会中，职团主义和庇护主义无力调节各集团间尖锐的矛盾，“狭隘利益”逐渐取代“相容利益”成为社会主导，权力机构成为社会各集团力量角逐的竞技场，“俘获”政府成为各集团争取自身利益和避免利益受损的唯一途径。政府在不同时期沦为特定集团的“俘虏”，使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更多来自于各集团间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改变无效率产权结构的需要。狭隘的利益集团控制政权后，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制定和实施政治经济政策并宣扬它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其他集团利益受损，产生相对剥夺感，立即开始政治动员，不断积聚力量阻碍政策实施，甚至控制政府。由于没有哪一个集团的力量大到足以完全控制其他集团，因此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呈现出独特的“钟摆现象”。掌权的利益集团推行于己有利的制度本质上是对其他集团和民众资源的掠夺，这与整个国家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不相容，掠夺获益大于生产和创造从长期看会改变社会的激励结构，使社会陷入低谷。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政权时刻面临动摇甚至更迭的风险，更会造成统治者缺乏稳定的执政预期，掌权后往往选择“竭泽而渔”，立即最大化自身所属集团的利益，采取忽视长期契约执行、否认已有债务、从铸造新货币中谋利等“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并通过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巩固其政治支持。因此，阿根廷的发展悖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失败，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在特殊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各利益集团间异常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在缺乏社会中介调节和国家层面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被不断固化，造成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并被锁定在周期性震荡的无效率状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似的新兴国家，阿根廷的衰落从经验层面提供了很多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国家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例外，也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

意义的问题。作为“拉美化”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研究阿根廷的钟摆式发展及其由盛转衰的社会和制度根源，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比较视角。1978年，中国开启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开放。一般认为，我国进行的这场改革是在保证政治体制连续性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先易后难、从沿海到内陆的渐进式改革，其中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主线，国有经济改革和放松管控是关键。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借鉴了自由经济理论中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成分，但渐进式改革在避免剧烈冲击和动荡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权力运作方式，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转型。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近年来收入分配分化的问题更是不断凸显，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促进和破坏双重作用开始显现。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强弱势群体之间对立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成熟，不仅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有可能成为孕育中国式民众主义的温床。以“中国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在于市场化”为代表性观点的民众主义舆论声浪在国内已不鲜见，有的人甚至为“文革”招魂，这成为阻碍市场化改革努力的最大敌人。中国与阿根廷虽然相距遥远，改革方式迥异（渐进式与激进式），但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并行的发展进程，当前也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迫切需要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众多民众处于原子化状态且缺乏公民意识等相似的情况和问题，阿根廷的“钟摆式”发展进程及其“危机—改革—危机”的发展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攻坚阶段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学者樊弓在《一个国家的破产——解读阿根廷命运》一文中写道：“阿根廷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宝贵的改革‘试点’……中国跟阿根廷一样面临深化经济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遇到产权“瓶

颈”。阿根廷面临的腐败问题，在中国人心中也是深深的忧虑。阿根廷的很多深层危机都能给中国以启示，中国如果要加大改革力度，时机还不算晚。<sup>①</sup>”

##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理论综述

### （一）现有文献对阿根廷发展悖论的解释及其缺陷

#### 1. 结构主义和政策失误论的解释

关于阿根廷的发展问题，结构主义学者通常将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归咎于依附性的外部因素及相关政策选择。美国学者威尔（Felix J. Weil, 1944）在《阿根廷之谜》一书中强调，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错失了三次发展机会：19世纪末阿根廷过度依赖肉类和谷物出口，没有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一战”期间，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弊端就已暴露出来，但政府未及时调整发展模式，没有采取政策保护幼稚工业发展，反而执意发展出口部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政府没有直面困难的政治勇气，反而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对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渡过难关。迪亚兹（Carlos F. Diaz Alejandro, 1970）认为，阿根廷1930年之前的经济模式非常成功，并未错失工业发展机遇。1930年后遇到发展困难，是由于“大萧条”后出口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佛多尔等（Jorge Fodor and C. A. MacDonald, 1990）认为，是外部障碍制约了阿根廷“二战”后的经济政策选择并造成了其发展困境。博金（Miron Burgin, 1941）认为，阿根廷众议院否决了旨在解决阿根廷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并使其尽快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新环境的“皮内多计划”，这是阿根廷错失实现经济现代化“黄金机会”的罪魁祸首。

政策失误论者多从不当政策导致资本积累困难以及要素价格和

---

① 樊弓：《一个国家的破产——解读阿根廷命运》，《南风窗》2002年2月下，第61页。

配置扭曲的角度解释阿根廷的发展问题。美国学者泰勒（Alan M. Taylor, 1994）提出，阿根廷近代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1913年以后阿根廷资本积累条件的持续恶化。魏斯曼（Carlos H. Waisman, 1987）强调，20世纪40年代后阿根廷发展出现了“逆转”，主要原因是政府执行了错误政策，特别是“以农补工”和内向型工业化政策以及职团主义的劳工政策失当，是造成该国衰落的主因。孔德（Roberto Cortés Conde, 1980）认为，阿根廷1930年之前的工业化就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市场的局限性和汇率贬值消解了阿根廷的成本优势。索尔伯格（Carl E. Solberg, 1987）认为，农牧业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出台的政策不可能使佃农成为土地所有者，这使得阿根廷铁路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农牧业技术水平和市场体系迟迟得不到提高，最终造成阿根廷的发展滞后。林毅夫在《经济发展与转型：战略、思潮与自生能力》（1994年）一书中提出，政府发展战略是解释为什么阿根廷等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发展缓慢而资源贫乏的东亚实现了快速发展的关键。政府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应立足于升级禀赋结构，而不是罔顾禀赋结构直接寻求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在竞争性市场中，禀赋结构升级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动，会促使企业出于逐利动机和应对竞争的考虑，自发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政府只需建立并维护竞争性市场制度，并确保要素价格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禀赋丰裕程度变化即可。同时，政府还应做好技术和产业有关的信息服务，对可能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并加强金融、法律和社会等相关制度建设，为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创造良好环境。

国内学者中，沈安（2007年）认为，阿根廷19世纪60年代开启现代化进程，并依据比较优势选择了出口型农牧业经济模式，这一模式适应了当时阿根廷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使阿根廷获得了宝贵的外汇，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资金条件。但富裕不等于发达，阿根廷发挥比较优势抓住了赚钱的机会，却失去了工业

化的机遇，成为拉美地区生产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较为落后的国家。陈舜英（1982年）肯定了庇隆政府经济政策成就，但也指出其政策两大失误之处，一是片面强调工业发展，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基础作用，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二是不顾阿根廷的发展实际盲目套用国外经济理论，借助“政府干预之手”，追求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通胀达到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等目标，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 2. 对民众主义及其“福利赶超”政策的批判

随着学界对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和对拉美民众主义（民粹主义）的批判，“福利赶超”被普遍认为是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陷入“增长陷阱”乃至危机的罪魁祸首。萨克斯（Jeffrey D. Sachs, 1989）认为，悬殊的贫富差距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政府制定和出台政策时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不得不保持社会支出份额，并将改善贫困群体福利水平作为施政重点之一，但这会造成错误的政策选择和糟糕的经济后果，最终反而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特别是民众主义为了达到“福利赶超”的目的，往往采取过度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终造成恶性通胀和财政不可持续。国内学者中，樊纲等（2008年）认为，拉美国家普遍奉行民众（民粹）主义政策，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政策，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补贴和就业保障制度，实现低收入群体收入“跨越式”增长，以此来缩小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但正是这种不顾实际的“福利赶超”，给拉美国家带来恶性通胀、财政收支失衡、债务和金融危机、经济停滞等一系列恶果，最终使经济落入“陷阱”之中。

学界一般认为，阿根廷的“福利赶超”举措始于庇隆政府，庇隆主义也被视为拉美民众主义的典型和代表。学界从“福利赶超”的角度分析“阿根廷之谜”多集中于将阿根廷由盛转衰归罪于庇隆

主义政权的政策失误。美国学者坦奇（Vito Tanzi, 2007）提出，正是庇隆政府创造的“永久性财政问题”使阿根廷经历了一个从富裕国家变成贫穷国家的历程。庇隆政府 1946—1955 年间执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是通过剥削农牧业出口建立起来的，政府将 GDP 的约 30% 用于社会福利开支，不仅造成阿根廷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还使其陷入永久性的“财政恶性循环”中。美国学者刘易斯（Paul H. Lewis, 1990）认为，阿根廷 20 世纪的国家发展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庇隆经济政策的失当，特别是庇隆主义经济政策将劳工再分配的诉求置于农牧业和工业发展需要之上，一开始就遭到工业家、商人和农场主的反对和抵制，最终导致其疏远政府并撤回投资。而对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一经破坏就很难得到恢复，这正是阿根廷危机的根源。迪亚兹（Carlos F. Diaz Alejandro, 1970）认为，庇隆政府对外国投资百般限制，对发展贸易和提振出口并不关心，为满足其民众主义分配方式更是不惜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政策失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汇短缺，引发了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增长丧失了持续的动力。波尔坦蒂埃罗（J. C. Portantiero, 1977）认为，1955 年 9 月庇隆进行的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试验遭遇首次失败，这标志着阿根廷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启、40 年代巩固的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庇隆将广泛的收入分配模式引入经济发展中，终结了阿根廷的资本积累周期。

国内学者中，陆万军等（2014 年）在对比了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东亚部分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后提出，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拉美国家难以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为回应民众诉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政府更倾向于选择高福利这条“捷径”，通过高税收和强管制等方式干预经济并直接进行收入分配调节，但这种逆市场方向而动的政策会影响经济和制度的转型，从长期看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分配问题，还会付出经济效率损失的高昂代价。樊纲等（2008 年）将庇隆主义作为拉美民众主义的代名词，认为对于

阿根廷危机和拉美国家 20 世纪遭遇的“失去的十年”，国内基本以总结新自由主义的教训为主。但事实上，对拉美影响更为深远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却是民众主义及其“福利赶超”政策。福利赶超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绩效，其教训主要体现在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忽视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和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三方面。

## （二）阿根廷发展进程中“钟摆现象”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状况

1983 年，阿根廷经济学家马塞洛·迪亚蒙德（Marcelo Diamand<sup>①</sup>）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拉美政治经济变革举措”研讨会上做了题为“阿根廷钟摆何时方休？”的报告，首次提出阿根廷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钟摆现象（péndulo argentino）”。所谓“钟摆现象”，是指阿根廷的发展策略特别是经济政策总是在民众主义（或扩张主义）和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模式间剧烈摇摆。其中，民众主义模式反映了民众在经济领域的诉求，它崇尚凯恩斯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追求更好的收入分配和完全就业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通常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和名义工资、实施价格管控实现，同时还会借助汇率和公共服务价格等政策工具确保生活成本基本稳定；第二个目标通常以保持内需旺盛来实现。自由主义模式反映了农牧业、金融业、传统产品出口业以及部分民族资本家的诉求，它强调经济秩序、财政纪律、效率、预算平衡、信心、吸引外资和民众的必要牺牲。迪亚蒙德的这一研究发现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学者通过这一“钟摆现象”来描述阿根廷发展进程的特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96）即认为，阿根廷乃至拉美多数国家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有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主导间走极端的现象，即“钟摆现象”。由于钟摆是机械的，这一概念没有考虑到反馈机制和共识形成机制对“钟摆”摆动幅度可能产生的减缓作

① Marcelo Diamand: “El péndulo argentino ¿Hasta Cuándo?”,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Económica. CERE, 1987, <http://www.iade.org.ar/modules/noticias/article.php?storyid=5613>.

用，但从历史上看，在拉美国家中这种减缓作用的确十分微弱。

关于“钟摆现象”的产生，迪亚蒙德认为，民众主义模式重分配而轻投资、轻出口，其高收入、高福利政策不过是“寅吃卯粮”，外汇储备耗尽之时就是该模式终结之时；而自由主义模式在外汇枯竭和国家濒临破产之时“临危受命”得以确立，其对内实施紧缩政策、对外加大引资力度和初级产品出口等举措虽然能够在短期恢复外汇储备，但中长期却会导致就业情况和工资水平持续恶化，经济会因需求不振而陷入衰退泥潭。这两种模式的内在缺陷是产生“钟摆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外债的持续增加、“以农补工”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牧业和工业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这使得“钟摆现象”不是静态往复，而是一种动态的恶性循环。迪亚蒙德将“钟摆现象”定义为阿根廷长期性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像民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政府缺乏足够权威“真正”落实其改革举措，而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发现或并不重视阿根廷经济中的生产结构失衡问题，即农牧业生产率远高于工业生产率。民众主义通过高汇率保障工业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做法，抑制了农牧业发展和出口，最终导致工业化资金来源日益枯竭；自由主义通过货币大幅贬值推动农牧业出口，造成了去工业化和过高的社会成本。

迪亚蒙德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阿根廷学者米诺和达维拉（Miño and Dávila, 2011）认为，造成“钟摆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阿根廷发展中的“三元悖论”，即无法通过工业化同时实现完全就业、较高的实际工资和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三大目标。保守主义解决“三元悖论”的方法是依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依照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但其主导的货币局制度在稳定价格的同时，付出了牺牲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外部失衡的代价，最终导致价格失控和经济衰退。民众主义解决“三元悖论”的思路表现为两个机制，一个是通过实施进